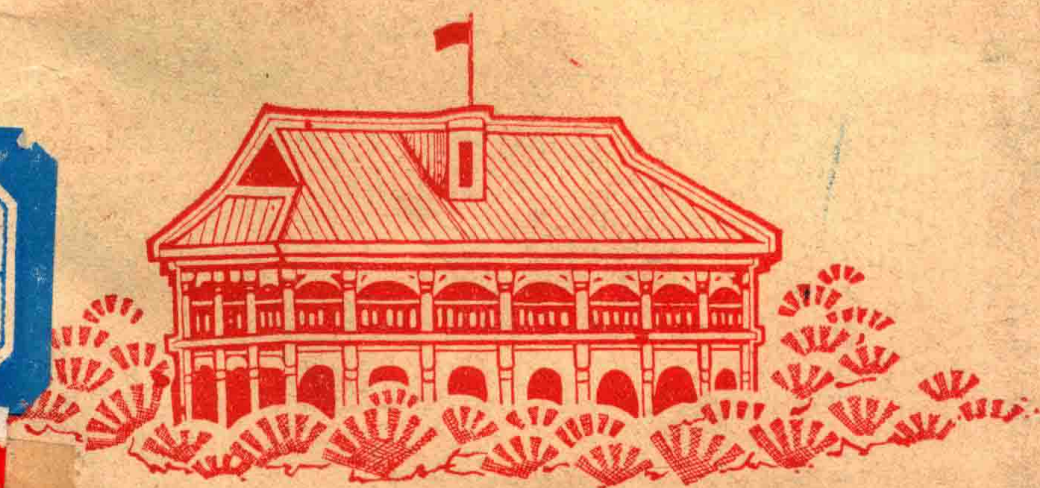


遵 义 会 議

資 料 匯 編

(內部學習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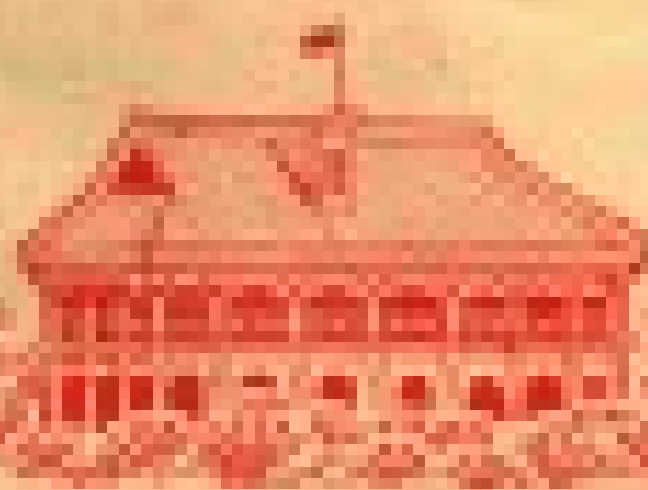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九月

建 文 金 網

圖書文庫

（中國文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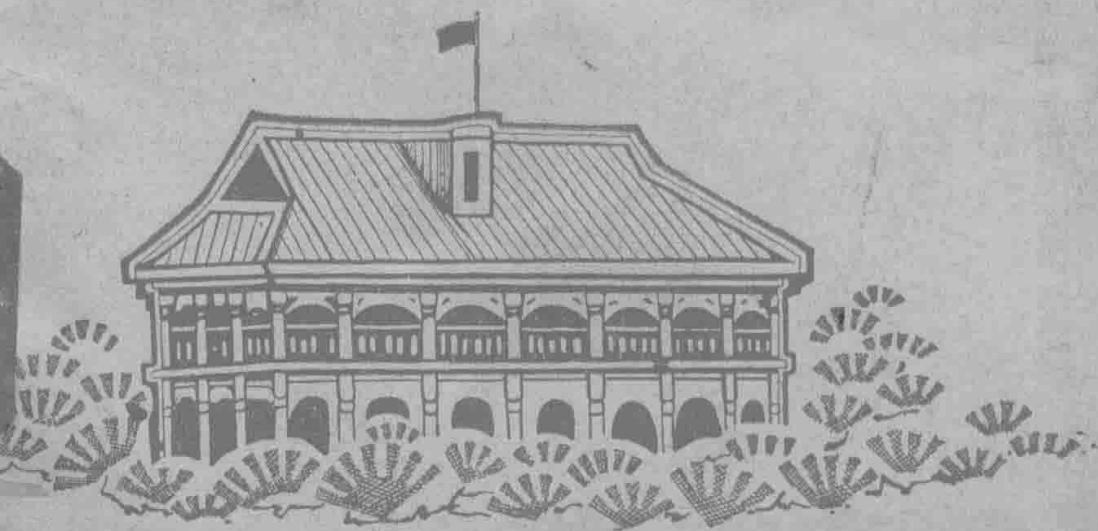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九月

遵 义 会 議

資 料 汇 編

(内部学习資料)



一九七二年九月

目 录

毛主席关于遵义会议前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论述

关于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

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关于遵义会议.....

关于批判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有关遵义会议的资料

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红军长征，进军贵州.....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红军四渡赤水.....

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抗日前进阵地.....

——陕北.....

中共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前后有关决议、

命令、指示和电报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

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抄）.....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

《共产党十大政綱》.....	
通令(进遵义城沿途呼的口号、进城八項注意).....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針的决定(摘抄).....	
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中央政治局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	
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中央責令张国焘北上电.....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保护喇叭(嘛)寺庙的布告.....	
红军进入贵州向少数民族发布的布告.....	
关于对苗僑民的口号.....	

长征及遵义战役统计资料

长征綜合统计表.....	
1931——1933年反围剿战績统计表.....	
遵义战役战績统计表.....	
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主要战斗统计表.....	

毛主席關於遵義會議前後 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論述

關於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169頁

然而當着敵人改變其軍事原則使之適合於同紅軍作戰的情況的時候，我們隊伍中卻出現了回到“老套”的人們。他們主張回到一般情況的方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经验，輕視帝國主義和國民党的力量，輕視国民党軍隊的力量，對敵人採用的反動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喪失了除了陝甘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³²紅軍由三十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降到了幾萬黨員，而在国民党區域的黨組織几乎全部喪失。總之，是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他們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其實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學到。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

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71頁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79頁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

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89頁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89——190頁

由于不認識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

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96页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96——497页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

犯了原则性的錯誤，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損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訂本513頁

……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規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訓中糾正过来。这种糾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績。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訂本515頁

……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認識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许多的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階級（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稅收政策）和富农（分坏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識分子，肃反中的“左”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認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錯誤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

鬥爭；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鬥爭，否認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

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訂本720——721頁

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內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轄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沒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沒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份，执行了所谓“一切鬥爭”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錯誤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內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錯誤的。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4月19日）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訂本750頁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

《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訂本901——902頁

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不应重复。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146页

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份采取过左的错误政策，如象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151页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

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182 页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93——194页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

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蝕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蝕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195 页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197 页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障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障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204 页

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205 页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箝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箝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209 页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

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213 頁

由于沒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縮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錯誤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針，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錯誤方針，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針。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錯誤的东西。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215 頁

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沒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219 頁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

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219——220頁)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220——221頁)

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陣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賀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陝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陣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